

周錫山 编校

王維文學著 國文美論集

● 北岳文艺出版社



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5 字数：318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

书号：10397·121 定价：3.70元

序

罗继祖

锡山同志编王国维文学论著竟，谬以予为识途，既以稿囑讎正且索为序。予幼时及见观堂先生，及先生歿，先祖为编刊遗集，复忝预校字，然于王先生学术未能窥其万一也，何敢为序。惟自先生歿后，卮言日出，嗣后《历史人物》、《我的前半生》等书复鼓其澜，甚尘上矣。予去年辑《永丰乡人行年录》，据事实辟之而折衷于陈寅恪先生之言，陈先生于罗王无偏袒者，故能独见其大。嗣予又作王先生的政治思想一文，据先生遗札语，更畅言之。罗王晚年之隙出于家庭细故，本不足计，而激于一时意气不相下，又无人焉出为转圜，事竟不解迄于先生之歿，致启人疑。实则先生心系故君行朝，惧甲子逼宫之再演，而见行朝泄沓莫为之备者，窃效古人尸谏，此所以有“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遗言也。

大抵先生之学屡变，光绪辛丑（一九〇一）、壬寅（一九〇二）之间，始研究西洋哲学，醉心于尼采、叔本华之学说，一变也；先生初好为诗，至乙巳（一九〇五）至丁未（一九〇七）之间，弃哲学而转入文学，喜填词，二变也；是年入都，鉴于中国文学最不振者莫如戏曲，于是专攻戏曲，三变也；辛亥（一九一

一）革命，避地日本京都，于是悉摒弃以前所学改而治古史、古文字及训诂音韵，四变也；乙丑（一九二五）就职清华，课余兼治西北地理及辽金元史，五变也。先生存诗始戊戌（一八九八）至己巳（一九〇五）八年间仅得四十八首，壬子（一九一二）癸丑（一九一三）两年独多，著《壬癸集》一卷。先祖尝劝先生作诗，先生答云：“公前劝永（先生以永观名堂，故简称永）作诗，但作诗易费时日，一诗之成，动笔后，迟则三五日无不成者，惟以前实须酝酿，其期长短不定。壬癸间所以多作者，实缘此年与公整理书籍，其暇辄寄之空想……癸丑以后便自不同，故今年本极拟作数诗，而兴会不属，亦未敢动笔……”（见拙辑《观堂书札》）故此后先生作诗甚少，词则尤少。

锡山此集录先生诗词，间收寻常酬应之作。予谓可汰，锡山以篇什无多仍存之，以见先生虽寻常酬应亦精审不苟作如此也。锡山渴欲从予求先生遗著中涉及文艺若《人间词话》比者，予无以应。予谓《人间词话》问世以来，其“境界”、“隔与不隔”诸说，学人倾倒之至矣，视为王先生文艺观之总代表奚不可，何必更求？锡山于文艺研几有年，其亦肯吾言否耶？

一九八二年岁次壬戌一月二十二日罗继祖谨序于长春
吉林大学之后书抄阁

前 言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他是我国近现代之交最杰出的学者之一，是有很大大国际影响的学界巨擘。在短短的二十余年学术生涯中，他在文学、美学、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音韵学、版本目录学、敦煌学、西北边疆地理和哲学等多种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一系列卓著的，不少还是划时代或开创性的成就。在美学和文艺理论领域中，他常有石破天惊之伟论，有多种经典性的论著。前辈学者曾给予极高评价。如郭沫若认为他的论著“领导着百万后学”（《历史人物·鲁迅与王国维》）。吴文祺指出：他是“以西洋的文学原理来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无疑的，在黑暗的中国文学批评界，王国维是一盏引路的明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静安先生》）缪钺《王静安与叔本华》中说：“海宁王静安先生为近世中国学术史上之奇才。学无专师，自辟户牖，生平治经史，古文字，古器物之学，兼及文学史，文学批评，均有深诣创获，而能开新风气，诗词骈散文亦无不精工，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论其方面之广博，识解之莹彻，方法之谨密，文辞之精洁，一人而兼具数美，求诸近三百年，殆罕其匹。”（《诗词散论》）皆为评价精当之论。因此批判地继承这位被鲁迅先生赞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热风·不懂的音译》）的王国维先生的丰富而精湛的学术遗产，是我们的责任和一种享受；而通过他的论著和生平，探讨这位“老实到象火腿一般”（鲁迅《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的大学者所走过的成功之路和惨痛的人生教训，对我们年轻一代的求学者来说，也很有现实意义。

（一）

王国维于一八七七年阴历十月廿九日诞生在浙江省海宁县旧治县城内一个中小地主阶级家庭中。父亲王乃誉因家境不好，弃儒从商多年。王国维四岁时母亲即病故，他靠叔祖母和姑母抚养长大。他因始离襁褓即丧生母，更兼自幼身体羸弱，这就给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忧郁的种子，形成他郁郁寡欢，不苟言笑的悲观性格。

王国维的故居离开钱塘江边仅数百米，面临海潮汹涌的喇叭形江口。他在波涛声中长到二十岁。二十年中，寒窗苦读十五年。他五岁进私塾，背诵和学作诗文。家中有书五、六篋，除十三经因年幼而不喜外，其余书籍，塾中放学归来常常浏览。九岁时，父亲回乡奔祖父丧，以后父亲便长居家中，每天晚上对他亲加教诲，“夜课骈散文及古今体诗若干”。他父亲又精通书画篆刻，尤以画为擅场。所以王国维自幼受到文学艺术的良好熏陶。他从小不喜帖括之学，于八股文用力不多，但在一八九二年六月，他赴岁试，入州学，即初露才华，名噪乡里，居海宁这个文才荟萃之地的“四才子”之首。他的《自序》回忆说，这一年“十六岁（实足是十四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储蓄之钱，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从此他精心

钻研《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打下坚实的史学基础。后来王国维对科举失去兴趣，一心读他的文史典籍。

甲午战争爆发以后，王国维作为一个爱国青年，目睹国势衰危，很想发愤“新学”（指西方的先进科学），以图报国，但家中虽有中人产业，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要出国留学，经济力量则远远不够，故而他居恒怏怏，面对大海，不禁感慨：“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

一八九八年阴历正月，二十岁的王国维来到上海，进康梁派的《时务报》当书记、校对。四个月后入罗振玉的东方学社学习英语、日文和数理学科。他每日下午三时后去学社读书，没有时间复习功课，所以考试竟不及格，被列入退学之列。但罗振玉在同舍学生扇头见王国维所题绝句有“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之句，极为赞赏，他慧眼识伟器，拔英才于群贤之中，对王国维大加奖勉。于是他不仅关照执教的日本教师破格让他继续学习，而且在《时务报》关闭之后，免他学费，并让他在社内兼职，解其生计之忧。从此他在罗的提携下学业大进，并与罗结下不解之缘。此时王国维迷上西方哲学，醉心于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毕业后，罗振玉介绍他到武昌农务学堂任职，又聘请这位二十三岁的年轻学者担任罗自己创办的《教育世界》杂志的主编。同年，罗又资助他去日本留学，“昼习英文，夜至物理学校习数学”。不到半年，因脚气病发作而辍学回国。罗又先后推荐他到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通州师范学校、苏州师范学校任职任教。在这三、四年中（1901—1904），他创作了大量诗词，钻研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名著，发表多篇美学论文和译文，成为引进西方哲学、美学的第一个学者。自一

九〇四年起致力于文学的研究，是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是我国文学批评史和美学史上第一篇运用西方文艺理论和近代科学方法来评论文学名著的论文；并把《红楼梦》与歌德的《浮士德》等西方名著对照，是我国第一篇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作品的论著；在红学史上它又是第一篇比较系统的研究专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一九〇八年起分批问世，直到近年才见全璧的《人间词话》，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一个总结。此书的最大贡献是提出著名的境界说。《人间词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美学史上有数的名著之一。

自一九〇七年起，王国维又开始从事戏曲研究。到辛亥革命之前，已写出多种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如《戏曲考源》、《唐宋大曲考》、《曲录》等。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跟罗振玉一起携眷东渡，移居日本“避难”，成为效忠清室的“遗老”。次年他完成了《宋元戏曲考》，并因此影响日本汉学界，掀起一股中国戏曲研究热。《宋元戏曲考》是他多年戏曲研究的一个最后总结，郭沫若认为此书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是权威的成就”（《历史人物·鲁迅和王国维》），诚为确论。此书第一次勾画出我国戏曲发展历史的轮廓，高度评价中国古典戏曲的认识价值、艺术价值及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并进一步发展了“境界”说，是影响巨大而深远的戏曲史开山之作。此后他在罗振玉的建议下，潜心于经史小学，与文学、美学研究分手了，诗词创作也很少。他在甲骨文、古代史诸方面的研究不断取得辉煌成就，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崇敬。郭沫若正确地指出：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祖，王国维则是中国新史学的开山祖（出处同前）。

王国维在一九一六年自日本返沪后，先后任仓圣明智大学教

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他为教授，胡适等人也曾荐举，但王国维辞谢不就。一九二三年他应废帝溥仪之召，携眷北上居京，做溥仪的老师，为“五品”“南书房行走”。一九二五年起应聘为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校方本请他当院长，他自认为不擅做行政工作而未允，但在院长梁启超到任前，他实际上主持着院务。在清华期间，他为国家的潜在需要而研究西北边疆地理和辽、金、元史。这位年已五十的学界巨擘虚心向精通中亚和古代少数民族文字的年轻文史专家罗君楚（时仅二十余岁）和陈寅恪（时仅三十余岁）学习。他诲人不倦，培养国家英材多人，深受全国青年学者的一致爱戴。可惜他因愚忠于清室，又兼性格悲观，眼看北伐节节胜利，废清复辟无望，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这位正当盛年的一代学者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享年五十岁。德国东方学术研究会本拟聘他为名誉会员，因他去世而未成。

王国维先生的一生，不汲汲于名利，而孜孜于学术。他博大精深，学贯中西，在学业上是所向披靡的雄狮。可是在政治上他却又是迷入歧途的羔羊，最后竟为倒台的反动政权自杀殉命。他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纵观王国维的生平和时代，他之所以能成为三百年中罕见的学术大师，有下面几个主客观的原因。

从主观上说，首先是他的学习和研究态度用功、踏实和严谨。他虽因病弱，每天仅能工作几小时，但他锲而不舍，数十年努力如一日。第二，他不仅如郭沫若所说：“是很有科学头脑的人，做学问是实事求是，丝毫不为成见所囿，并且异常胆大，能发前人所未能发，言腐儒所不敢言”（出处同前），也即思想解放，

而且目光远大，在学术道路上始终与时代一起前进；他既善于吸收传统遗产的精华，又善于吸收西洋新学和科学新法，并能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善于正确而及时地制定研究方向和课题，具有可贵的创新精神，故而能确保其持久的突进势头和不断产生新的辉煌成果。第三，他天资聪颖过人，无疑是个不可多得的学术天才。

从客观上讲，首先是他父亲懂得培养方法，不仅狠抓他的早期教育，而且给他创造了良好的文艺气氛。第二，他初涉学界，即遇良师。罗振玉晚年大节有亏，应该批判；作为遗老，也理应受到非议。但罗振玉早年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道路，而且才华出众，办学和译介外国科学论著，很有成绩。他不遗余力地收集和保护珍贵文物、故宫档案，其功绩不可抹煞。在近三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他对学生王国维无私地提携，慷慨地资助，毫无保留地提供历尽苦辛得以珍藏的研究资料（秘籍、文物、甲骨等），并介绍众多学者与之相识，为其细致周到地创造研究的环境和条件。他识拔素昧平生的王国维于艰难困境和未入学坛之时，数十年如一日地尽心尽力培养、照顾，学生学成后毫无同行之忌而又有无限珍惜之心。这样识才爱才的伯乐，世所罕觐。王国维得遇如此恩师益友，实为人生中之最大幸事！论者一般诘难、指责罗氏者有三，皆不能成理。一曰王氏之死因罗氏逼债，在经济上压榨王氏。罗氏一生慷慨资助者非王氏一人，他培育贫苦学者如王国维者，乃出于天下之公心。王先生逝世后，罗家祖孙三代资助，刻印王氏全集，稿费全归王氏孀孤，又多方设法给以抚恤，于王先生及其家属情深如海。二曰给王先生以坏影响，拉他当清室遗老。此乃似是而非之论。王国维是一位成熟的学者，并非一个无知青年，他的政治道路当然是自

已选择的，并非他人引诱、胁迫而得以左右。他最后殉清自杀，显得比罗氏更忠于清室。其三曰罗氏在王氏丧子后携女而归，造成两人友谊破裂。我认为此诚为事实，但责任在王国维一方，不能责怪罗振玉。当初罗氏将爱女许配给贫穷而无势的王家为媳，纯是一番盛情美意。否则凭罗氏的声望与地位，他如有政治目的或贪财之心，完全可以另择高枝。而罗婿乃王国维长子，为王氏亡妻所生。后母本不易与前妻之子搞好关系，何况是前妻亡子妇，更何况是丧夫之前妻子妇。事实是王家内部确有纠纷，而王国维书生气十足，极不善治家。罗振玉怕女儿受苦，从上海将女儿带回天津，舐犊之情，无可非议。罗振玉没有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不惜遭物议之虞，采取非常措施保护年轻而守寡的女儿，用今日的眼光看还应嘉许。王国维既无力调整婆媳关系，又因罗女之归而很伤感情和面子，与罗振玉的友谊有了裂痕。王国维心中虽不愉快，但行动仍很克制，双方仅罕有来往而已，并未绝交。而纵观罗王关系，如无罗振玉当初的提携、帮助，则无后日名震遐迩的大学者王国维。

第三，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正是西学东渐的黄金时代，他得以借他山之石，攻己之玉。又恰值沉睡四千年的甲骨文、埋没千余年的敦煌石窟和积累、秘藏数百年的内阁大库档案相继重见天日，为他提供了驰骋才华的广阔园地。

王国维先生造成悲剧的主客观不利因素也不容忽视。从主观上讲，由于封建意识强烈，忠于倒台的反动政府，而对当时的反清革命和国民革命则抱误解、敌视态度，在政治上走入末路。从客观上讲，他幼年丧母，更兼体弱多病，性格忧郁内向，给他的一生蒙上一层浓厚的阴影；成年后丧妻失子，后又与挚友不和，不免产生老境凄凉之感。以上数者郁结，便沉淀为一种思想杂质

——悲观。悲观最后引向悲剧。他对西方悲观主义哲学——叔尼学说的爱好，也是一种不利因素。不少学者因此认为叔尼的毒素害死了王国维，我不敢苟同。一则叔尼不赞成自杀，二则王氏爱上悲观主义哲学首先是他自己生性悲观。更重要的是，王国维接受叔尼学说，从主要方面来说，是他们的精华部分；叔尼磅礴的文学才华和精密的思维方法，大有利于王国维学术思想的形成和表达。

关于王国维自杀之因，六十年来已有许多论文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认为王国维的死因很多，而以殉清为主。王国维自杀的念头非萌之于一日，而有数年之长。早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清逊帝溥仪被民国政府赶出皇宫，南方革命声势渐大，他怀“君辱臣死”之志，惶惶不可终日，常欲自杀，因家人严加监护得免。二七年自杀前，他不露痕迹故得逞。遗体身藏纸条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再辱”二字远续二四年旧事，其“义”昭昭。直到仙逝之日，他犹拖着象征清室的辫子，清亡后的十六年中不惜惊世骇俗如此，其于故国之耿耿忠心，溢于言表已多多矣！但王国维自杀的主因固为殉清，殉清却远非唯一原因。他又不满遗老阵营中的勾心斗角，不以“大局”为重，有复辟无望之怨；他本一贯敌视革命势力，北伐军进湖南后处死土豪劣绅叶德辉，叶氏为著名学者，王氏误以为北伐军要毁灭他视之于比生命价值更高的传统文化，更生新的忧虑；如前所述，他幼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人生三大不幸他一人兼而得之，加上疾病频发；故友不和，情绪倍加忧郁。于公于私，无事顺心，做人又极认真，不肯忘怀。凡此种种，引成他心境极坏，都造成他自杀的因由。总之，他的自杀出于以殉清为主病的精神崩溃的并发症，而并非一个两个

的孤独起因。

王先生给我们的历史教训是，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必须认清政治方向，追随进步，向往革命，否则，明珠投暗，则必将自戕自毁。一定要培养和形成乐观的、向前看的精神状态，这样才能将曲折的，有时甚至是风波险恶的漫长人生道路走到底，以取得最终胜利。

(二)

王国维的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主要有五个基本观点：天才说，古雅说，游戏说，痛苦说和境界说。他的文学观和美学观比较全面和辩证地反映出文学和美学的本质和现象，不仅在当时起了进步的指导作用，而且在当今也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和意义。

王国维崇拜康德，赞成和引进康德的天才论，提出自己的天才说。他说：“‘美术（按即艺术）者，天才之制作也’，此自汗德（今译康德）以来百余年间学者之定论也。”（《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康德的天才论是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和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其中有荒谬之处，如认为天才就是天赋的才能，它给艺术制定法规。我们也认为有天才，天才确有天赋的可供某种才能高度发展的土壤。之所以讲“某种”才能，是因为天才是有方向性和对口性的，他在某种专业上可能发展、培养出非凡的才能，但并不适用于其他领域。某一专业的天才人物，由于大脑素质、遗传因素与性格、心理、感觉等多种条件，特别适宜于此专业的学习和创造。有人乐感强，是音乐良材；有人对色彩、线条特别敏感，可能成为丹青高手。即如才能中极重要的因素——记忆力，也是有对口性的，有人善于记数字、公式，有人则

长于情节记忆和情绪记忆。我们与康德的分歧在于,他认为天才就等于天赋的才能;我们认为天才仅是天赋的可供智力高度发展的土壤,天才人物所具的特殊才能全靠天才加上后天的勤奋和正确的努力方向。天才能否给艺术制定法规?康德认为能,我们认为不能。艺术法规只能发现,不能创造。天才不能制定艺术法规,但其所创作的经典作品,在表现生活和客观世界方面显示的高度技巧,在正确处理作品与生活的关系上,都能成为别人的楷模,正确地反映了艺术创作的规律。王国维显然也有这样正确的认识,他在《文学小言》中一再指出:“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天才者,……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助之以德兴,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并曾借用宋词名句生动形象地描绘天才人物进行艰苦学习、探索和创造的曲折过程: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阶级也。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

王国维认为天才又需后天的“莫大之修养”,比高尔基所说“天才就是勤奋”的认识更为全面,因为勤奋并不能代替和全等于天才。王国维还强调为大事业和大学问而必备的牺牲精神和“众里寻他千百度”这种百折不挠的坚忍精神。至于王国维对文艺创作的科学规律的探索和阐释,则见于他的“境界”说。

王国维虽引康德之说：“美术者，天才之制作也。”他仅是从一个角度讲的，所以他又认为非天才的一般文学家也可创作出成功作品，而杰出文学艺术家惨淡经营的优秀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与天才之作等量齐观。他说：

以绘画论，则有若国朝之王翬，彼固无艺术上之天才，但以用力甚深之故，故摹古则优，而自运则劣，则岂不以其舍其长之古雅，而欲以优美、宏壮与人争胜也哉。以文学论，则除前所述匡、刘诸人外，若宋之山谷，明之青邱、历下，国朝之新城等，其去文学上之天才盖远，徒以有文学上之修养，故其所作，遂带一种典雅之性质。而后之无艺术上之天才者，亦以其典雅故，遂与第一流之文学家，等类而观之。（《古雅之在美学上的地位》）

可见王国维的天才说，并不是唯天才论的唯心主义的文学观和美学观。他对天才的认识是较为全面和辩证的，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与天才说相联系，王国维提出古雅说。古雅，是他对艺术的形式美的探讨。但王国维所说的“形式”这个概念，兼具我们今之所谓内容和形式的两个概念。他将美之“形式”分为“第一形式”和“第二形式”两种。他解释第一形式说：“就美之自身言之，则一切优美皆存于形式之对称变化及调和。”关于第二形式他阐释道：“至宏壮之对象，汗德虽谓之无形式，然以此种无形式之形式能唤起宏壮之情，故谓之形式之一种无不可也。就美术之种类言之，则建筑、雕刻、音乐之美之存于形式固不俟论，即

图画、诗歌之美之兼存于材质之意义者，亦以此等材质适于唤起美情故，故亦得视为一种之形式焉。释迦与马利亚庄严圆满之相，吾人亦得离其材质之意义，而感无限之快乐，生无限之钦仰。戏曲小说之主人翁及其境遇，对文章之方面言之则为材质，然对吾人之感情言之，则此等材质又为唤起美情之最适之形式。故除吾人之感情外，凡属于美之对象者，皆形式而非材质也。而一切形式之美又不可无他形式以表之，惟经过此第二之形式，斯美者愈增其美，而吾人之所谓古雅，即此第二种之形式。即形式之无优美与宏壮之属性者，亦因此第二形式故，而得一种独立之价值，故古雅者，可谓之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也。”（《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文中所述的“境遇”“材质”，与我们所讲的作品的内容有一定共同之处。他在此文中还有进一步的论述，因篇幅所限，此处不一一赘述。

王国维的古雅说与他的其他诸种美学观一样，至今受到人们的曲解。直到近年出版的论王专著，仍望文生义地批评他强调古而反对今，强调雅而反对俗（通俗文学），并因此得出结论：王国维的古雅说是唯心主义、反现实主义的美学观。（参见陈元晖《王国维与叔本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萧艾《王国维评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王国维对“古雅”这一概念有明确说明：“又其制作之人决非必为天才，而吾人之视之也，若与天才所制作之美术无异者，无以名之，名之曰‘古雅’。”（出处同上）古雅指非天才创作的优秀艺术作品。又认为“雅”乃指“第二形式之美。”（出处同上）古雅说与提倡是古非今，崇雅轻俗的落后文学观风马牛不相及。恰恰相反，美学大师王国维赞成焦循提出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并是将其加以发扬光大的最有力者。他在《宋元戏曲考·序》中，开宗明

义地说：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王国维宣传的是文学的发展观，深刻指出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文学，今古并重，通达公允。在上述引文中，他以戏曲小说为例阐述古雅的第二形式，把元曲（指元杂剧）列为一代之文学，在《人间词话》中将《水浒传》、《红楼梦》作为客观诗人之作的范例与他极赞赏的词家李煜对举，在《红楼梦评论》中指出“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都充分说明他对通俗文学的崇高评价。众所周知，王国维的三大美学名著中有两部是论述通俗文学的：《红楼梦评论》和《宋元戏曲考》。这两部研究通俗文学的划时代和开创性的名著，在当时起过极大作用，至今仍有巨大影响。

王国维接受康德、席勒、叔本华等人的影响，鼓吹“游戏”说的观点：“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婉变之儿，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无所谓争存之事也。其势力无所发泄，于是作种种之游戏。逮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惟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而成人以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对其自己之情感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文学小言》）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又说：“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的游戏。”并认为文艺是医治空虚的苦痛的方法，可以作为一种